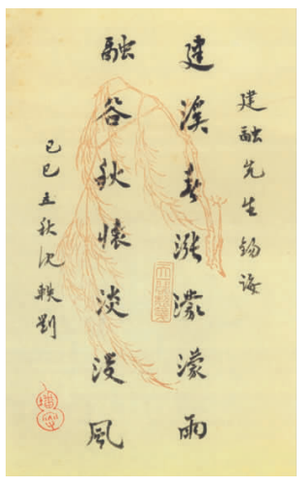
聊为陇亩民

徐建融

今天，知道“沈轶刘”这个名字的人应该不会太多了。但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，他却是诗坛词苑的活跃人物之一，与白蕉、邓散木、唐云、沈禹钟、施叔范等结为诗友，忧时感世，相与酬唱，慷慨磊落。由此可看出他的旧学功底和影响，在当时决非泛泛。鼎革后，因抗战期间避兵八闽，任国民党福建省府办公厅主任，被定为“历史反革命”。尽管“罪名”吓人，但他后来的经历，相比于他的诗友们多被打成“右派”甚至流放青海劳教，还算是幸运的。归田后不仅没有遭到严酷的“专政”，不久还被外聘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（今上海古籍出版社）的编辑，直到1966年出版业停顿才回到老家浦东高桥务农。



每想起前辈学术人生的日常和常识，我以为作为农民的沈先生比之作为专家、学者的文化名人们，实在更为典型。行文至此，正好女儿回家，我让她在手机上“百度”一下“沈轶刘”。胪列的诗词作品不少，但人物内容并不多，而对他的评价竟是“一生坎坷”。我不禁哑然失笑。由此也联想到自己的整天伏案，在旁人眼里“干嘛这么辛苦”，怎知我实在其乐无穷。

左图为沈轶刘先生书赠作者的嵌名联

先生名桢，字轶刘，以字行。早年就读于上海中国公学文学系，毕业后一直从事报刊的编辑和撰稿工作。虽身躯弱小而笔力雄强，有“开山五丁手，诗国万人敌”之誉。

我与沈先生相识并有幸得到他古诗文方面的指导，是在1973年之后，缘于唐云先生的介绍。他与我同在高南公社，他属镇南大队，我属友好大队，但两家相距并不远，步行不过半个小时的路程。界浜一号桥桥堍的北岸，一幢高墙老宅濒水而筑，规模颇盛，在民国时的高桥，称不上大户，但也属殷实人家。不过大部分的房屋土改时都被分给贫下中农居住了，留给他的似乎只有东西向的三间还是四间。因为子女都在市区工作生活，只有老夫妻二人，所以倒还显得宽敞。青砖铺地，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清幽简朴。屋外是宅基地，蔬菜种到了围墙脚，门前稍空旷，用于养鸡、晾衣。

我第一次上门，他正在“咯咯咯、咯咯咯”地给鸡喂食，其乐融融。后来多次去看他，有时遇上生产队的农忙劳动，群众都在满头大汗地弯腰割麦或插秧，他却在田埂上东张西望，见哪一个身后的秧苗快没了就及时地送过去，见谁口渴了就赶快递上一碗大麦茶。他乐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大家看我年纪大了，又不擅长农活，所以特别照顾我，从来不让我干重活、累活。”有时他刚从大队部接受例行的“四类分子”（地、富、反、坏）教育训话回家，照样乐呵呵的样子，一点看不出被“专政”者的苦恼抑郁。对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，我首先想到的便是陶渊明荷锄种豆的平淡天真。

80年代以后，先生“脱帽”解放了，他的孙女还是外孙女考上了美国一所大学的博士，心情更为愉悦。于是便开始出门走动，联络旧交并结识了一批新的诗友，陈声聪、周退密、施蛰存、钱仲联等，互为酬唱，并为施先生主编的《词学》审稿、撰稿。唐云先生、张建权先生（邓散木夫人）、金学仪先生（白蕉夫人）等则是由我帮助联系上的。一些年轻的旧体诗研究者也慕名时有书信或直接上门请教。如后来去了澳门的施议对，先是读的钢铁硕士，接着又转攻中国社科院的诗词博士。沈先生对他大加赞赏，认为后生可畏，并与我的先读物理后读美术史引类比附，期望殷殷。

这段时间，我已从乡下迁居镇上，两家距离缩小到只有一刻钟的路程。所以，他也时不时到我家串门，给我送来我请他批改的诗稿和他的和诗，笺纸细字钤印，极尽风雅。其他诗友与他唱和的诗稿，同样也是笺纸小楷，有时还有长卷。他每分享于我，供我学习并收藏。回想起来，我呈他的草稿没有一件是毛笔宣纸的，而全用钢笔抄写，对旧诗文的“敬事”态度，实在是万万不及前辈了。

其间，他又开始了对自己诗文集的整理，辑为《繁霜榭集》，包括诗、词、诗论、词话等，由富阳的一家古籍印刷机构刻蜡油印线装出版，分送友人和全国各大图书馆。虽然不是正式的出版物，他却看作千古寸心，对错字一一亲笔订正。后来我才明白，传统的文化，经、史、子是面向全社会的学问，所以有广泛的阅读面，需要社会性的出版发行；而集，主要是个人的言志抒情，一般情况下只在小圈子里流传。所以，旧时代的诗人词客，大多自己找人刻印个人诗文集，绝没有我们这一代只有国家出版社所出才是正规出版物的观念。避兵福建时所写的《八闽风土记》则由福建的某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。还有一部《清词菁华》，是他在兼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时，副所长兼副总编辑陈向平先生授命他编写的，搁置二十年后，亦由当年的同事、龙榆生先生的学生富寿荪先生推荐给安徽文艺出版社。社方因沈先生的名头不大，必须富先生具名方答允出版，沈先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社方的要求。

沈先生参与的另一部著作是《诗韵新编》，1976年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，1978年经修订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再版。这部韵书不具作者姓名，系作为出版社的一个集体项目。但其实，核心的作者是沈先生，他在此书上用心、出力最多。据他自述，当年能去编辑所兼职，主要就是因为编订此书的需要，其他有思想内容的古籍出版，一般没有他参与的分。包括《清词菁华》的编选点评，也是在此书完成之后才接受的新任务，当然还是集体项目，如果在当时出版，估计不会有他的具名。这部诗韵的编采，遵守“平仄须严，用韵可宽”的原则，在严守格辙的前提下有所创新，把通常所用的平水韵由106部压缩为18韵90部，用起来非常方便。但修订本的出版沈先生并没有参与，估计当时的出版社方面已不清楚此书的最初奠基人之一是沈先生了。至于今天的不少旧体诗作者，主张不用新韵而恪守平水，实无关大雅。

1992年浦东改革开放，我和沈先生的家都在外高桥保税区的建设中动迁到了富特新村，他在三村，我在四村，相隔不过一条马路，步行五分钟。沈先生心情愈佳，虽年逾九旬而依然思清体健，不料翌年竟无疾而终。

沈先生本人的诗文，他自认为得益于陈维崧。但我以为他早年偏向于唐宋，有“以天下是非风范为己任”的意气风发。尤以一组咏七十二抗日名将诗最称雄迈：“死为雄鬼食胡肉，生见金瓯插汉旗”；“醉卧沙场谁不朽，五千貂锦夕阳西”，笔下纸上，如有风云奔走、雷霆震发，分明华夷，激昂大义，读之令人血脉贲张。我以为这类诗近于辛弃疾的豪放派。《八闽风土记》则于山水形胜之外并记民情风俗，虽在血肉长城的硝烟之外，犹存“还我河山”的家国情怀，深郁厚重，有柳宗元《永州八记》的笔力和意境。无论辞藻和洗炼，还是精神的严正，近世文言游记，我以为无出其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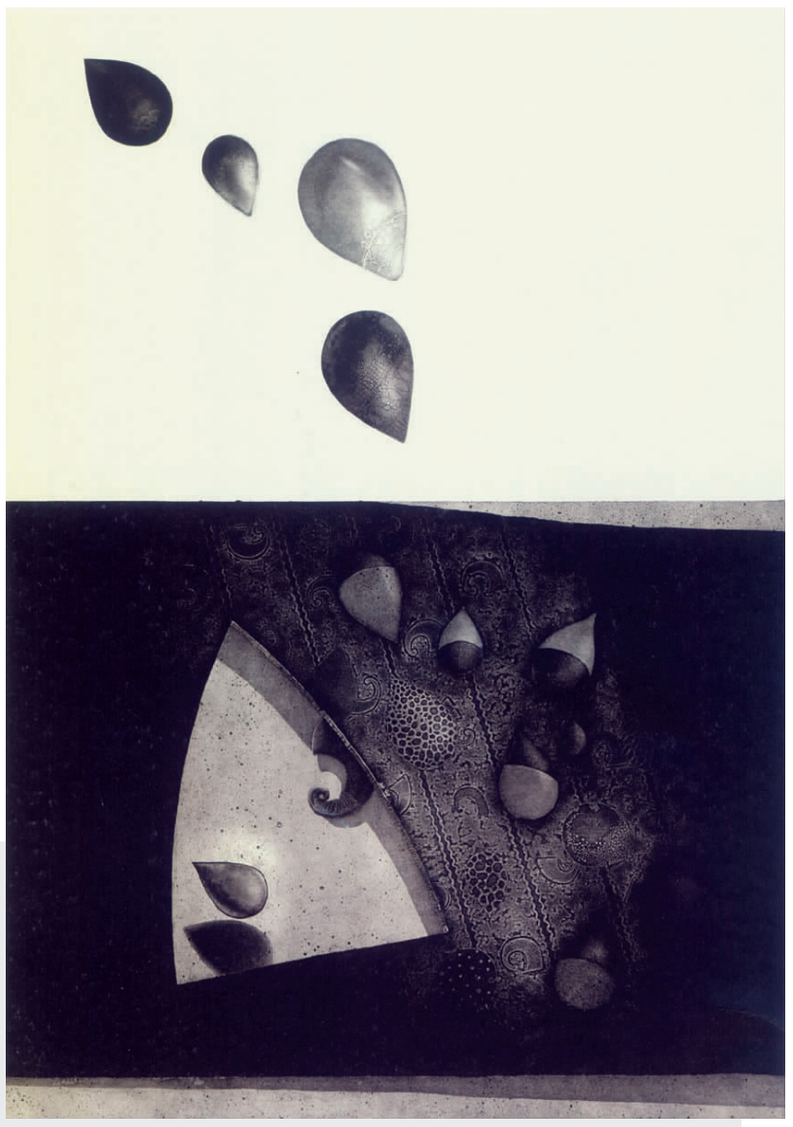
中年以后的沈先生，因形格势禁，潜心于诗韵和词论的研究，虽仍时有诗词的写作，不过咏“芦粟”、“落苏”之类。看似无聊，但一片“此中有真意，欲辩已忘言”的境界，我以为近于陶渊明。“长吟掩柴门，聊为陇亩民”的生活，不正是沈先生此际的真实写照吗？但在词论、词评中，还是可以隐约读出他少年时的风义，如《清词菁华》中评顾贞观词：

瑰辞隽藻，清初确可肩随陈、朱两大家。与吴江吴兆骞为生死至交，兆骞以科场案株连，久戍宁古塔。贞观因性德之力，援而归之，天下高其风义。其寄呈《金缕曲》两阕，肮脏如被肝胆，至今传诵不绝。他如《青玉案》《夜行船》，皆风骨挺异，满腔生气，悉非凡响。

则又有陶渊明“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”、“刑天舞干戚，猛志固长在”的当年怀想了。

80年代之后，沈先生才真正洗尽绚烂，完全入于平淡。所撰《高桥四园林记》纯粹纪实，一点不染尘垢，对沧桑兴废，作不冷不热观，行无香无味文。包括为我所做的嵌名联“建溪春涨濛濛雨，融谷秋怀淡淡风”，没有一丝一息的“愁滋味”。

虽然，辛弃疾在中年后也倾慕陶渊明，但读了沈先生，我觉得稼轩的心境始终是孔明而没有进入到渊明，即使他口口声声地渊明，至多也只是“心向往之”而其实是“未能至”的。而沈先生，几乎一字不着陶渊明，却真正进入了渊明的境界。于是，写诗、赋词与种地、喂鸡一样，都成了他的日常生活。每想起前辈学术人生的日常和常识，我以为作为农民的沈先生比之作为专家、学者的文化名人们，实在更为典型。行文至此，正好女儿回家，我让她在手机上“百度”一下“沈轶刘”。胪列的诗词作品不少，但人物内容并不多，而对他的评价竟是“一生坎坷”。我不禁哑然失笑。由此也联想到自己的整天伏案，在旁人眼里“干嘛这么辛苦”，怎知我实在其乐无穷。



方向·雨
（版画）
伊万·马特耶夫［保加利亚］

不仅仅是“预言”

张持坚

在《参考消息》上看到一篇来自西班牙的文章——《一封写于2070年的信》：现在所有的河流、水库、池塘和地下水都已经被污染或是早就枯竭。周围随处可见的只有沙漠。曾经每个成人一天的最佳饮水量是8杯，现在只能喝到半杯。由于干燥缺水，20岁年轻人的肤质看上去像40岁一样。人的平均寿命是35岁。水不可能被生产出来，氧气也因为树木稀少而变得日益稀薄，新生代的智商也随之降低。水成了人们最为渴求的珍宝，黄金和钻石已经一分不值。作者在“信”中“介绍”自己时年50岁，“但看上去就像85岁。”“我患有很严重的肾病，因为我很少喝水，我知道我已经来日无多，现在我属于这个社会中最老的人群。”他“回忆”自己5岁、也就是2025年的时候，“公园里栽满了绿树，家家都有漂亮的花园，我可以在花洒下面痛痛快快洗上1个小时的澡；现在我们只能用湿毛巾沾上矿物油擦洗皮肤。那时女孩们都长发飘飘，风姿绰约；现在的她们只能剃光头发，才能避免用水洗发。”他的女儿听了他小时候的故事问：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？“我如鲠在喉，无法不感到愧疚，我们从来没有把大自然的警告当回事。而现在，轮到我们的下一代来付出高昂的代价了。”“信”的最后作者写到：“我多希望时光能够倒转，回到还可以做些什么拯救地球的那个时候，希望整个人类都能够深切理解这一切……”

我把“信”剪下来，巴掌大一薄纸，拿在手上却觉有巨石般沉重——这虽是篇“预言”，但它虚远吗？

环境恶化是世界性的紧迫问题。1972年联合国就召开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，提出“只有一个地球”的口号，呼吁各国政府和公众为改善环境，造福全体人民和子孙后代共同努力。这封来自西班牙的“信”格外触动人心的，是作者女儿“现在为什么变成这样”的哀叹和作者对自己漠视大自然的警告、恣意挥霍资源而让后代承受苦果的“愧疚”。这，不是在警示当下的我们吗？环境问题政府要担起责任，而作为消耗自然资源的我们每一个人同样责无旁贷。有同胞到德国旅游，饭后剩了不少菜肴，邻座的德国人看不下去，厉声斥责。同胞却不以为然：“用的是我的钱，关你什么事。”德国人反驳：“钱是你的，物质是大家的，浪费的是人类的资源！”前不久上海东方科技论坛聚焦“微塑料海洋污染与控制”问题，揭示的现象令人愕然：我们几乎每天用的洗面奶、沐浴露之类的日化产品中不可降解的微塑料大量排入大海被鱼吞食，90%鱼类样本已发现这种微塑料，成为鱼儿的慢毒药！2015年世界自然基金会一项报告也指出，20世纪70年代以来，49%的海洋动物消失了，过度捕捞是主要原因之一，之所以过度捕捞是因为人类对美味的贪欲。

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提高，日子过好些无可厚非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消耗资源。实际上，过度消耗物质与提升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并无必然关联。92岁谢世的王永庆是我国台湾地区首富，他吃饭的原则是简便，午餐和员工一样一份盒饭；穿的原则是整洁，一双运动鞋要穿好几年，一条毛巾用得起毛了还舍不得换新的。他常说：“虽是一分钱的东西，也要捡起来加以利用，这不是小气，而是一种精神，是一种警觉，一种良好的习惯。”世界首富比尔·盖茨也有类似理念，他说：“一个人只有当他用好了他的每一分钱，他才能做到事业有成，生活幸福。”

我国《“十三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确定适时开征环境保护税。这是针对企业的。不知对个人过度消耗环境的行为会否征税？以我国每年餐桌上浪费的粮食超过2000亿元为例，除了对当事人批评教育，是否应课税以示惩戒呢？

“地球能满足人类需要，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。”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我们谁都不愿意“2070年的信”成真，但要牢牢地把它锁在“预言”的范畴里，不让它“窜”出来，人类只有敬畏自然，珍惜自然，除此别无他途。

“谁有五十本书？”和“金羊毛”

沈亚明

诗人徐志摩生于1897年1月15日，今天是他120周年诞辰。

父亲沈仲章在北京大学当学生时，听过徐志摩的课，大概就在1931年，即徐志摩去世的那年。

我印象中，父亲有个印象：徐志摩最反对学生光读教材课文，主张博览群书。我强调“印象”，是因为想不起父亲有否提及徐志摩的具体言辞，唯恐父亲以己之心度人之腹。而父亲的具体言辞，我也记忆模糊了，只留有对印象的印象。假如不注明，辗转相传，我的话也许会被放入父亲之口，甚至徐志摩之口。

不过下面这件事，父亲对我讲过不止一次：

徐志摩名气大，架子小，上课不拘束，会与学生闲聊。某日，议及课外阅读，徐志摩向全班发问，你们谁有五十本书？

通常这类场合，父亲是不会抢先“显摆”的。但同学们都没吱声，他憋不住了，答言道：我有。

“五十本书”，这有什么稀罕？那时的大学生怎么啦？

我也不明白父亲的同学是怎么回事儿，不可瞎猜。但我想起，父亲时常念叨早年北大图书馆的方便，以及图书馆员的博学和乐于助人。父亲到北大的第一个学期，天天泡在图书馆。他原先在唐山大学读的是土木工程，不太熟悉文科类书目。他说，往往你只要对图书馆员大致说一下，正在关心什么，他们就会建议读什么书，而且马上替你找出来。你去还书的时候，他们又推荐你可能会感兴趣的相关书刊。很快，父亲在图书馆员的热情指点下，不仅提高了对文史哲书籍的了解，也学会了不少跟踪追索的本领。

但北大不乏“怪人”，多位父亲老友提及，沈仲章就是一个。怪人难免有怪癖，嗜书便为其一。图书馆再方便，书还是被“圈养”管理。若在自家领地“散养”放任，人与书相处无间，岂不更自在？父亲偏好“攒养书”（不敢冠以“藏书”），始于他少年时代。如今我已步入老年，还有父亲遗留的书籍待理。父亲与书，前前后后纠缠太多，这儿不宜扯远。光说自1926年父亲考入北大，至1931年已是五载，积攒的书刊应当远远不止五十本。

Virginia Woolf（弗吉尼娅·吴尔夫）在To the Lighthouse（《去灯塔》）中有句话：“Books, she thought, grew of themselves.”（“书，她想，自己会长。”）对这句引文有不同译法，我取字面直译，“传承”歧义，顺着grow/grew的主要义项之一“长”，往下说父亲与书。

父亲不曾交代，学生时代他攒了多少书。假设书本“自己会长”，只怕一不小心，便会失控。我倒记得，父亲读大学时，有个被书拖了后腿的故事。

父亲在北大先读理学院再读文学院，本科“读”得超长。但到了1932年，除了他拒不补课的军训与党义，哲学学士所需的学分已经修满。虽然明文规定军训、党义是必修，校方还是赶着要发文凭给沈仲章，而他却赖着不肯毕业。父亲向我透露，当时肚子里盘算着个“小九九”：毕业了便不得再住学生宿舍，而他寝室里书多，搬家太费事儿！不如再考一次，转读法学院经济系。一个人名在注册录上一出一进空折腾，众多书本就可合法安守根据地。划得来！

对受书籍之累而惰于迁居的心理，我深感同情。大凡宅内积存些书本纸张的人，想来也能理解？

还是转回1931年某日的北大课堂吧。且说徐志摩问了“谁有五十本书”之后，见有学生应答，脸露欣喜。他向答言者索讨了住址，当场“警告”，我要去看看你有什么书。

隔了些日子，徐志摩果真去“查访”了。

父亲从上北大第二年起，在学生宿舍西斋窝了好几年。一人一屋，相当宽敞。几件简单的家具如桌椅床铺占地不多，余下空间“长”书正合适。1980年代上半段，父亲曾上京“寻脚印”，踏访了沙滩。见他当年的学生单人卧室，住有一家老老少少好几口子。

西斋的寝室以“天、地、玄、黄”分区编号，父亲先住天字第一号，后来挪到玄字二十六号。依稀记得父亲说过，他在后一处呆得久些。我推测在1931年，有幸让名诗人徐志摩光顾的，该是玄字号那屋。

徐志摩进屋坐的时间不算短。他看了些书，问了些问题，发了些评议。师生俩聊得蛮随意，也挺投机。

临走，徐志摩表示，他到北大教课时，有空的话，会再来谈书谈天。他还留给沈仲章两本书，大概不外乎雪莱、拜伦或者什么外国诗人的集子。听父亲的口气，是英文书。

令人哀惋的是，1931年11月19日，徐志摩由上海飞往北平途中，坐机坠落。诗人在山东罹难，再也不能来北大。为了纪念，父亲在徐志摩所留的其中一本书的扉页上，用拉丁文写了几句话，大概是略述相关事由及情感。

父亲晚年回想，徐志摩留下的两本书，到底是送还是借，当年不曾问明白。其实要不是发生意外，有的是见面机会，读完当面讨教，是收回还是留赠，徐志摩自然会说。待父亲起了忧虑，那两本“念物”却早已不复身边。

那两本徐氏念物，在父亲手中的过程大致如下：

1937年父亲为了救护万余枚居延汉简，匆促离开北平，不能多带行李。父亲把攒积的书装了几大箱子，托付朋友保管。可父亲珍视徐志摩给的书，带着南下，伴随他到了香港。

1941年秋，父亲出差上海，随身携带一本徐氏念物，另一本留在香港“木屋”——就是戴望舒笔下的“林泉居”，父亲与戴望舒和徐迟同住那栋小洋楼多年。因为戴望舒的缘故，后一个斋号如今更为人熟知。

没想到12月上旬珍珠港事变，父亲滞留苏沪，戴望舒困居港岛，木屋房东马尔蒂夫人怕也自身难保。父亲留在香港的“家当”，包括徐氏念物之一，都不明下落。

算起来，徐志摩在1931年留给沈仲章的两本书，一本父亲保存了十年，另一本保存了三十五年。可惜到了1966年，我家书库被端了窝。那另一本躲过了战火的徐氏念物，还是在劫难逃，不知所终。

父亲与徐志摩交往时间短，回忆也不多。我印象较深的，除了书，还有云。

父亲说，徐志摩讲课时，常常会提及坐飞机观云，大赞特赞云彩之美妙无常。具体怎么讲的，不记得父亲曾作复述，也可能被我忘却。但我记得，父亲讲述旅行时，提过徐志摩描述的云。

父亲性喜探山，又好摄影。1930年代中期，有次他独自钻进庐山，一路峰峦重叠，云雾迷濛。有那么一刻，或许是父亲翻过山岭，穿过厚云，或许是天豁然开了个口子，他只觉眼前突然一亮。定睛望去，阳光四洒，云朵染泽，丝丝卷卷，金色闪耀。父亲顿感兴奋异常，由衷地惊呼：“Golden fleece! Golden fleece!（金羊毛）”

严格说“呼”字该加引号，因为父亲记不清，自己是否真的叫出了声。不过他认为自己看得真切，眼前的云，正是徐志摩在课堂上形容的“golden fleece”。我见父亲不止一次重温当时感受，每每喜形于色，情难自禁。

“金羊毛”出典于古希腊神话，这里撇开不究，因为父亲意在形象。而像“金羊毛”似的云，到底什么样，我仍在努力想象。

父亲的旅行经历，不少我听得相当熟。我知道他那次上庐山，是背着照相机和三脚架的。因为父亲老“吹”，他在庐山三叠泉月光之下，拍摄到一张夜半奇景。冲印成像后，百思不得其解，疑为鬼使神差。但父亲在目击“金羊毛”的那一刻，是否来得及用镜头捕捉，我不晓得。

我还知道，父亲玩彩色摄影，得等到1950年代才开始。1930年代他只拍黑白照片，怕是难录“金色”。而父亲早年的摄影，历经动乱劫难，绝大多数失散，包括上文言及的庐山三叠泉夜景。

很遗憾，父亲在山上亲见“金羊毛”时，徐志摩已经长眠地下。他俩生前没有机会比较脑中的留影，交流心中的感触。

更令人感叹的是，据闻1931年徐志摩搭乘之机偏离航道，云雾太浓也是因素之一。

但愿徐大诗人在临终前未曾遭受大惊吓，而是满眼迷幻之云，满腹赞云佳句，恍恍然好似落入柔软温暖的“金羊毛”……